



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

邹 铖

内容提要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1941年,对敌后作战原则问题,中共高层存在看法上的微妙差异。毛泽东虽然不排斥运动战,但显然更坚持游击战的方针,彭德怀等人则在游击战外,更加强调运动战的必要性。正因此,1941年前八路军在作战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运动战色彩。前方所以长期重视运动战,关键在于很长时期没有完全摸清日军战斗力的底。而毛泽东所以信赖游击战,却对前方的运动战予以包容,和没有完全摸清日军战斗力的底也不无关系。随着百团大战结束,中共高层普遍意识到此时与日军进行过多、过大规模运动战尚不现实。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共识。

关键词 毛泽东 彭德怀 运动战 游击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对八路军出师后的作战原则,中共高层大多认同游击战为基本方针,不过在具体实施上存在差异。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在即将到来的对日作战中,八路军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基本原则。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刘伯承等人则提出“运动游击战”应成为八路军进入抗日战场后的作战原则。会上,两种意见出现各自表述局面。最终,对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战原则,中共高层未能在会议中完全达成一致。八路军进入华北后,也就不免存在分歧,直至1941年底才真正完全统一了认识。那么,在当时中共高层中,为什么对八路军作战原则长期存有不同的意见呢?他们之间的看法又是如何走向完全统一的呢?

目前,关于这些问题,学界已有一些讨论。田玄认为,在作战原则上,抗战时期,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毛讲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原则,和彭等人提出的“运动游击战”原则是一致的。所谓彭与毛军事意见存在不一致的观点有误。^①然而,如果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之间的认识没有分歧,那么,为什么双方又要对同一个内容的作战原则冠以两种不同名称呢?从常理上来说,这是没有必要的,完全否定双方间的分歧不符合历史的实况。这一点,在1943年夏召开的一二〇师军事教育训练会议中,贺龙有过说明:“抗战刚开始时,毛主席就指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是,后来由于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① 相关讨论,可参见田玄《彭德怀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考析》,《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为彭德怀“运动游击战”问题历史公案一辩》,《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捣鬼,改成了什么运动游击战,还有什么游击运动战。”^①

与田玄不同,杨奎松肯定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在作战原则上存在分歧。不过,随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为敌后作战原则,双方意见就大致统一起来了。^② 揆诸相关材料可以看出,杨奎松的结论仍有可议之处。在《论持久战》面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在报告中仍旧使用“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③ 如刘伯承在1938年7月完成的《抗战一周年的战术报告》中写道:从1938年1月至7月,部队战术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深入传达了运动游击战指导原则”。^④ 而在1941年6月底下发的《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中又指出:“在军事上,分队起侦察、防谍、钳制、疲敌、耗敌作用,干队起袭弱、机动、突击作用,实行合量的游击运动战。”^⑤ 据此可见,在这一时期内,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的看法还是有一些不同。

在田玄与杨奎松之后,黄道炫不但肯定了全面抗战前期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在作战原则上存在分歧,而且指出这与前、后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有关。毛泽东强调游击战,限制前方的运动战倾向,在于从全局而言,游击战最适合中共武装力量的生存与发展。但前方就在地坚持角度来看,“既然游击战成为战略,那么运动战作为帮助游击的必要手段,也可纳入游击战的战略原则内”。^⑥ 如此解释的确有相当说服力,但严格地讲,依然有些不足。即当毛泽东认为游击战最适合中共武装力量的生存与发展时,为什么长期以来仅仅是尝试限制前方的运动战倾向,而没有彻底反对,甚至有时还要予以包容?而前方又为什么相信运动战能够成为帮助开展游击战的有效工具?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体两面性,只有将其讲清楚,才有可能说明白整个问题。

综上所述,对这个问题学界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本文在尽可能充分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尝试重新梳理整个经过,以期更完整、准确地勾勒出中共高层间意见分歧所在及形成原因,并分析双方何时、因何完全消弭分歧,从而在作战层面上深化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游击战争的认知和理解。

一、分歧初现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方面立刻觉察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能就此而起,因而迅速行动起来,尝试加速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以期尽早形成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全国团结抗日局面。1937年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对于中共的表态,国民党方面很快做出回应,并透露出将红军部署于平绥线的意向。7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令其通过西安行营复电蒋介石,同意红军“担任平绥线国防”,红军将在10天内完成出动抗日准备。同时表示,鉴于红军的特长在运动战而非防守,故应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红军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此后,随着日军不断

① 《在军事教育训练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夏),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文选》(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② 参见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③ 当时,在前方负责实际军事指挥的彭德怀等人,对作战原则有“运动游击战”与“游击运动战”两种说法。根据相关材料可知,这两种说法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彭德怀讲道:“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把它叫作运动游击战,或叫作游击运动战。”参见《彭德怀自述》编辑组编《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

④ 《抗战一周年的战术报告》(1938年7月7日),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刘伯承军事文选》(1),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⑤ 《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1941年6月3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377页。

⑥ 黄道炫:《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第16—17页。

增兵平津地区,中国避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7月28日,毛泽东和洛甫又致电负责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等人,令其由云阳回到西安后,通过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八月十五号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①可是,到了8月1日,毛泽东的态度却有所变化,调整了红军的出兵时机、规模、参战后的作战原则及承担的任务。在当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他指出依当前敌我情况,应让国民党方面同意红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②导致毛泽东这样调整的主因,是其对敌我情况的认识有所变化。

七七事变爆发前,红军未与日军交过手,毛泽东虽知道日军远强于国民党各派系军队,但并不了解日军真实的战斗力。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以往战争经验,结合一些对日军战斗力的估计,近乎本能地认为红军应避免打阵地战而行运动战。不过,随着平津陷落,毛泽东第一次感受到了日军的强悍程度。当时,驻防在平津、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出自有能打善战之名的西北军系统。中央红军中擅于打防御战的红五军团,就是由原西北军将领孙连仲的部队为基干组成的。所以,毛泽东对二十九军的战斗力是有一些具体认知的。可是,集结在平津一带加上后方机关总计不过20000人的日军,仅用两天时间,就突破了二十九军3个师的防线,占领了北平、天津,其攻击之犀利令人震惊。客观地说,平津陷落并没有出乎中共领导人意料之外^③,但陷落的时间应该大大早于他们的预期。由此,毛泽东也就不能不重新评估之前提出的出兵时机、规模与作战原则,向更加稳健的方向靠拢。

对于毛泽东的调整建议,云阳红军总部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8月4日,他们联名致电毛提出: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长”;“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三师主力出去仍可节约使用)”。^④对此,毛泽东立刻复电作进一步说明。对于承担的任务,毛泽东着重指出红军应“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因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独当一面。不过,在作战原则上,可采取“游击运动战”。而对出兵时机与规模问题,毛泽东则强调要顾及“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同时,闽粤边区何鸣部被缴枪的消息,又令毛感到国民党合作诚意不足,对尚未完全解决的后方问题实有给予足够重视的必要:“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因而,毛提出必须坚持“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大前提下,可向国民党方面“承认开拔主力”,即少则1/2、至多2/3的力量可派出参战,但具体“对蒋不说几分之几”。^⑤很明显,虽然在出兵时机、规模与作战原则问题上吸纳了朱德、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意见,但整体而言,毛泽东在复电中向朱、彭等人作出的让步还是有限。之后,应是考虑到电报中寥寥数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7页。

② 《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2),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③ 朱德在1937年6月23日分析全面抗战初期战局可能之发展趋势时说:“对付日本人的进攻,第一道防线应该是北平、天津地区,内蒙古和沿海,这些战线也许会守不住,后一道防线将是黄河防线。北方的部队及其领导人根本不行,一旦打起来,这些部队就会接二连三地被消灭。”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42页。

④ 《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1937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⑤ 《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1937年8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25—26页。

难以把所有问题展开说透,特别是对作战原则还有更进一步斟酌的必要^①,故毛泽东又于8月8日电告彭德怀、任弼时:“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②,希望当面把话讲清楚。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等22人。在会议上,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目前虽尚不能看见洛川会议上中共领导人的发言全文,但从相关人物年谱、传记等资料中,已可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及聂荣臻7位关键人物的讲话要点,故笔者在此将它们整理成表1,以利进一步梳理与分析。

表1 洛川会议上中共主要领导人发言要点

发言人	发言内容
毛泽东	“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红军的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之交,受阎锡山节制,红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1、创造根据地;2、钳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应适用游击战与运动战,还有红、白军共同作战”,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下蛋。立足自己,吃饱了饭再说”。“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③
朱德	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体”。“我们要谨防扒手!但过分防了也会限制自己。看清楚,我们自有办法”。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估计日本[军队]是外国军队,便利我们的行动。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指国民党军队)败了,不好”。“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能速决。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日军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并且在群众方面、地利方面,白军作战都要失掉一些效用[红军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华北方面地势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我们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 ^④
周恩来	“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今天是要使国民党的战略不束缚我们自己的战略方针。这不仅是军事问题,将来还有政治问题、全国群众工作问题”。 ^⑤

① 1937年8月8日发出于洛川举行会议电后,次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各部门负责人即先行召开了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显然,这与8月5日复电中对作战原则的表述存在差异。据此,可大致推断,在8月5日提出“游击运动战”原则后,毛很快又进行了重新思考,并认为对作战原则还要进一步斟酌。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2),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466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一九三—一九四九)》(中),第12页。
③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2),第468页;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页;《毛泽东年谱(一九三—一九四九)》(中),第16页;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④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79—480页。
⑤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页;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第162页。

续表 1

发言人	发言内容
彭德怀	“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在战术上要很谨慎,在胜利把握较多的时候,集中优势于敌人的力量来袭击敌人,用广泛的开展武装农民来掩护游击战争”。“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①
任弼时	抗战是长期的战争,“红军要保持战争的领导,一方面要发挥我们特长,一方面要保持我们的力量”。在战争中“争取独立自主”,“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这样,“对增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部队均有关系,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②
刘伯承	“我们的游击与运动要配合”,作战上还是“运动游击战”。 ^③
聂荣臻	“1、军队出动与战略问题:现在我们是整个阵线之一部,另外同日本作战,应时时顾到我们不要吃亏,因此战略上采取山地游击战,基本上要有独立自主,否则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可能发生问题。出动兵力为着很快地创造根据地,力量更大,影响更大,以前线的力量来争取条件,也是可以的;2、游击支队问题:大的游击队……小的游击队繁殖,应尽量与东北及其他地方的游击队打通,并派人去。现在干部对游击战争,独立的工作(能力)比以前差,在敌人后方的基础还是靠当地;3、外交问题:我们有许多关系,应进一步派人去工作,做军队中的政治军事工作;4、财政问题:各方面的经费都不够,以前是从地方筹粮,现在出动,再等是不可能也不应当的,开始应争取人民,不要侵犯其利益。战斗员生活上应同蒋介石士兵平等,否则工作不好做,并且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现在应多想点办法,如国际方面,募捐是可以的”。 ^④

由表 1 可以得到如下认识。在战争形势与自身战略发展方向上,中共高层基本认定抗战是一场持久战,华北主要地区的沦陷已不可避免。红军应深入日军侧后方,发动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组织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充武装,牵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并最终将自己的活动地域扩展至全华北。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中共高层的看法也近乎一致。在统一战线中,要保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在军事、政治及群众等各方面工作中,不要被国民党束缚。不过,对八路军出动时机、规模及参战后的作战原则,中共高层中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在出动时机、规模上,毛泽东强调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阶级警惕性,红军出动的缓急与规模要视国民党的态度与表现而定。对此,朱德与聂荣臻有一些不同意见,认为尽快、尽可能大规模出兵可能更有利。在朱德眼中,新形势下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只要保持警觉性就不会出大问题。出兵不宜过分迟缓,以免阻碍自身发展,及对国共两党两军的团结合作带来消极影响。聂荣臻则认为,前后方问题完全可以联系打通,通过积极出兵、建立根据地、增强力量、扩大影响,来创造解决后方问题的条件。

相较于出动时机、规模,中共高层在作战原则上的分歧就更大一些。从毛泽东的讲话——红军参战后,“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① 《彭德怀全传》(2),第 375 页。

② 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第 162 页;《彭德怀全传》(2),第 375 页。

③ 田玄:《彭德怀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考析》,《军事历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56 页;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第 162 页。

④ 《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3 页。

但着重于山地)——能够看出来,在作战上,毛泽东不仅把重点置于山地游击战,而且尝试尽可能地减少运动战所占比重。从文字上看,把“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一句,理解为“运动战”的同义语,当然是没有太大问题。不过,从执行层面而言,选择使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而放弃“运动战”一词,却很可能收到不同的效果。由于来自上级的指示中没有明确提出“运动战”,那么下级在贯彻方针的时候,出现只打游击战、不打运动战倾向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对此,经验丰富、心思缜密的毛泽东不可能想不到。因而,毛泽东此举意图明显在最大限度弱化、淡化运动战作战方式。这样做的基本出发点则与8月1日的调整一样,仍旧是求稳健,以获取既能辅助国民党军正面作战,又“时时顾到我们不要吃亏”、发展自己力量的双赢。

对毛泽东的意见,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及刘伯承均不同程度表示了异议。在他们看来,日军虽有武器精良的长处,但也有战斗经验缺乏及身处异国无社会基础等诸多弱点。红军若能保持足够谨慎,并利用日军这些弱点,调动日军,发挥自身运动战的特长,是可以在自身力量不受过大损失的同时,取得较大战果的。换言之,朱德、彭德怀等人估计,尽管整体实力上日军属于强者,但并非强到完全无懈可击、占不到任何便宜的地步。而且,就实际效果来说,打运动战、消灭日军,是有助于扩大自身影响、提高地位、发展力量、巩固统一战线的。因此,朱、彭等人认为,红军还是可以采取“运动游击战”作战原则,努力抓机会打一些运动战的。

综上所述,洛川会议上,中共高层在出兵时机、规模及作战原则上仍存在不同意见。作战原则上的不同认识又是讨论的焦点。最后,对出兵时机、规模问题,基本上是以毛泽东的思路为方针来解决的。^①而在作战原则问题上,由于对日军战斗力不完全摸底,毛泽东的谨慎意见最终未能得到完全认同。红军在作战中到底应该以何种原则为指导,也就只能留待作战实践中逐渐调整了。

二、毛泽东包容前方

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战,是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的辎重部队。当时,意识到八路军上下都存在的强烈求战欲,毛泽东也只好同意暂时集中一部兵力打击运动中的日军。通过平型关战斗,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第一次实际了解到日军武器装备和技战术优势,也体验到了日军战斗意志的顽强。^②林彪在战后总结报告中写道:

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③

① 毛泽东在1937年9月1日致周恩来电中,指出:“第一二九师非待国共间各主要问题解决后决不出动,这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在14日致林伯渠电中,为蒋鼎文催促一二九师上前线一事,又说:“一二九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确。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另外,从数量上看,八路军最后大概出动了2/3的力量上前线,剩余1/3驻防陕北。《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第18、21—22页。

② 参见《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各师的部署致中央军委、周恩来等电》(1937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平型关战斗详报》(1937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6),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③ 《平型关战斗的经验》(193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7页。

对手居然如此强悍,显然是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们没有想到的。不过,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争取机会打一些运动战的主张。在 1937 年 10 月 8 日发出的华北形势和八路军任务指示中,华北军分会仍旧要求各部:“正确的运用运动游击战……配合友军歼灭敌人。”^①在 193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毛泽东所讲的“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彭德怀则主张: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但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②面对这样的情势,毛泽东不得不在会下与彭德怀进行沟通。关于这次沟通的结果,现有研究认为,由于毛泽东吸纳了彭德怀的一些意见,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一句,所以,彭也表示满意。不久,随着《论持久战》问世,双方的意见基本达成了一致。^③然而,这个结论并不十分准确。此次沟通后双方所达成的“一致”仅存在于表面,分歧并未得到真正解决。这一点从毛泽东和彭德怀、刘伯承等人 1938 年 5 月—1940 年底完成的文稿中可以看出。为便于比较和辨析,笔者重新整理毛泽东和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在这一时期的相关论述,制成表 2。

表 2 中共领导人关于反“扫荡”与战略相持阶段作战的论述

论题 论述人	关于反“扫荡”阶段	关于战略相持阶段
毛泽东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④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在这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 ^⑤

① 《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1937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 页。

②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9 页。

③ 参见《彭德怀全传》(2),第 399 页。另外,杨奎松也注意到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自己最初的提法做出了补充与修正。之后不久,随着《论持久战》的面世,双方意见统一起来。参见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战略方针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第 122、126—127 页。

④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 年 5 月),《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 255 页。

⑤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 年 5 月),《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 257—258 页。

续表 2

论题 论述人	关于反“扫荡”阶段	关于战略相持阶段
彭德怀、 刘伯承、左权	<p>彭德怀：“当敌人进行围攻‘扫荡’时，我们采取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原则。我们虽居于内线作战地位，但不应当为这种情势所束缚。主力要适时运动到敌人侧背后方，正面则以小股节节抗退，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运动防御’的办法。我们的目的是使敌人分进合击，扑一个空，在敌之运动中间选择敌之弱点，集中主力歼灭其一路或数路。如果敌人各路已进至利害变换线，而没有暴露可乘之机，那我们就要毫不犹豫地坚决变换地位，要避免任何被迫进入战斗的情况，要用自己的积极动作，改变敌人的部署，为我们造成有利的条件”。“一般地说，我们应当消灭敌人一个大队（营）为主，使敌人至少要以一个联队（团）为单位作一路进攻”。^①</p> <p>刘伯承：“诸游击队（地方的或基干军队分遣的都在内）、自卫队是担任消耗敌人任务的”，“基干军队应在游击集团协助掩护之下，担任起消灭敌人的任务”。“在定下决心之时，与其以消耗为目的来打垮敌人一个联队，倒不如干脆消灭它一个大队较为有利”。“消灭敌人生动力量，才是我们野战军作战的主要目的”。“敌人在分进还不能合击之前，各路不能彼此策应，尤其是在山地策应困难，我们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就是先要采用积极的手段，选定敌人外翼侧的弱的而不易策应的一路，很快用大兵力而有重点的合击办法来击破它，并且击破它的地点和时间又必须在敌预定合击的地点和时间以外，以免陷于被动的地位。倘若各路合击的敌人，把我围在窄小地面将行捕捉之时，那就毫不犹豫地转到被围圈以外作战”。“在可能合击敌人时，则抓紧时机，调来合击敌人”。^②</p>	<p>左权：“在山岳地带必须给敌寇单独活动之大队之兵力以歼灭之打击，使敌寇不敢以大队之兵力单独行动”。^③</p> <p>刘伯承：“坚决地向着敌占区和铁道交通线，对敌伸入之据点则应以小部坚决地、经常地、真正地接敌活动，对敌延伸之公路，以小部掩护自卫队破袭，特别不准敌人修成由南到北与铁道平行的汽车路，而将基干军队和游击队不断输派，辗转破袭平汉线”。“特别是宽大正面的破击，收效更大”。^④</p>

由表 2 中毛泽东和彭德怀、刘伯承及左权的论述可整理出两点认识。其一，在反“扫荡”作战上，虽然毛和彭、刘都遵照内线作战原则，强调对多路围攻之日军实行各个击破，但在具体落实上却

① 《进入新阶段的华北战争》（1939 年 10 月 25 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8、72 页。

② 《对目前战术的考察》（1939 年 4 月 20 日）、《我们怎样从一九四〇年向一九四一年迈进》（1940 年），《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 211、214、343 页。

③ 《战术问题》（1941 年 2 月 15 日），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左权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02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1 页；《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1940 年 5 月 20 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 306 页。

有差别。毛泽东要求集中部队,通过多次袭击某一路运动中之“扫荡”日军,以逐步消耗并最终逼迫其后撤,有游击战的特征。而彭德怀、刘伯承等人专注于集中力量,以迅猛手段在短时间内“吃掉”一路“扫荡”日军,属于典型的运动战作战样式。其二,在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着重以游击战的方式恢复与扩张游击区与根据地,发展力量。先消灭少量日军和伪军,尔后,如果情况允许,再攻击日伪军守卫力量薄弱的小城镇和交通线。至于大规模破击日军基于交通线,一般仅是有帮助正规军正面作战的需要时才进行。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的看法与之不同。对于以一个临时混编步兵大队兵力窜入根据地内扰乱的日军,他们尝试实施迅速歼灭,并将主力部队的攻击重点指向日军基于交通线,打运动战倾向突出。总地来说,毛的作战方式是完全围绕游击战做文章,基本点在“消耗”,手段温和,作战规模小;彭、刘的作战思考更多的是以运动战为中心展开,偏向“消灭”,方法较为强硬,作战规模也较大。双方的观点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至于彭德怀、刘伯承等人为什么坚持应尽可能抓住机会多打一些运动战,则牵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整个战争的发展趋向与中共的自身定位,要求八路军必须不断经受硬仗的磨炼。抗战是一场持久战,不可否认,游击战确实在这场持久较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从战争全局来看,游击战所起的作用还是辅助性的,只有在主力会战中彻底击败日军,才可获得最后的胜利。对这一点,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仅仅是游击战争战胜不了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期望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自然不甘心、亦不愿满足于其领导的武装只能打游击战。左权讲道:“要使抗日战争胜利,便要求我军逐渐改善自己的装备,逐渐的提高自己的技术,也就要求我们的战术逐渐的完善起来。那种战术不仅是步兵的游击式的,而且是更正规的,是诸兵种联合的,更富科学内容及富有组织性的战术,简单地说是更要正规化起来。”^①可见,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在战争中还需要完成另一艰巨任务:把只会打游击战的游击部队提升为可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正规兵团。

毋庸置疑,游击部队学习打运动战有很好的基础。1939年春在山西黎城乔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刘伯承分析道:

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并无一条鸿沟,而是相互连贯着的……各县区游击集团中的干队,就是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的雏形,军分区的基本支队,也就是游击队壮大的正规军。在战术上说,这些基于支队和县区干队辗转会合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进行突击,就等于正规战的突击队,而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则等于它的钳制队。游击队袭击驻止之敌,是向正规战的进攻战斗发展的;伏击运动中之敌,是向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敌我都在运动之中,而我急袭敌人,这又是向非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②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实际上,两者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在乔村会议上指出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有连贯性的同时,刘伯承还强调:“两者的兵力大小不同,作战的威力也不同,指挥方式也不同,而战术的范畴,因之也就不同了。‘游击战是手工业,运动战是机器工业’。”^③因此,游击部队要真正掌握运动战的精髓,具备进行运动战的条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改善装备、持续地教育和训练必不可少,连续参加实战锻炼与总结经验教训也同样重要,此即八路军高级

① 《战术问题》(1941年2月15日),《左权军事文选》,第606页。

② 《对目前战术的考察》(1939年4月2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208页。

③ 《对目前战术的考察》(1939年4月2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208页。

指挥员所言:“战斗力之培养,要打,铁匠手杆是打粗的。只有打,战斗力才强。”^①把部队不断投入残酷的战火中经历考验,是真正提高他们战斗力的必由之路。

其次,对日军进行一些运动战,也有助于八路军在敌后立足和生存。前文已述,早在洛川会议上,中共已经明确判断华北地区的沦陷势不可免。不过,就整个敌后战局而论,让国民党军尽可能在华北地区多留一段时间,对于掩护八路军敌后展开及创造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持久抗战局面,还是有很大益处的。所以,朱德、彭德怀等人在1937年10月12日致毛泽东电中提出:“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的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使友军一下子不过黄河,消耗日寇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②秉承这一思路,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集中一部兵力在日军侧后方打运动战,以从战役层面有效地辅助国民党军作战。从最终效果来看,八路军这一时期的出击,不仅为其战略构想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用实际行动加强了国共两军之间的团结和信任。如1937年11月底,卫立煌致电蒋介石,为八路军兵员补充一事向蒋进言说:“朱部作战已久,伤亡日多,恳为转请,准其派员分赴豫鄂皖、湘鄂赣、湘鄂西各边区,继续招募补充兵若干。”^③

当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初步建立根据地后,巩固游击战争的后方——根据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八路军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巩固根据地,就要在战略相持期间进行军队整训和开展各项建设工作,生聚力量,以为反“扫荡”作战打下基础。而为了较顺利地展开这些工作,必须保证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所以,在战略相持阶段,还是需要八路军集中兵力打一些运动战,以最大程度阻遏根据地向游击区蜕化。通过围歼闯入根据地中心区内扰乱的小股日军,向日军高层发出警告,使其不敢随便派遣小股兵力出动扰乱,可以为根据地赢得一段较长的安定时间。^④而借助于大规模破击日军基本铁路线和主要公路线,则可动摇其“囚笼”政策的根本基础,进而遏止根据地在空间上被割裂为小块。^⑤一言以蔽之,八路军需要“以战斗的胜利换取空间与时间”。^⑥

最后,彭德怀等人坚持八路军要打一些运动战,还与其全面抗战前期对日军战斗力认识不足有密切关系。全面抗战前期,八路军总部“对敌人之‘扫荡’,提出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使其不敢孤军深入;在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使其不敢轻易下乡”。^⑦从事后结果来看,八路军总部在制定这一作战要求时低估了日军战斗力。对此,在1944年秋召开的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性格温和、办事公允的罗荣桓讲得明白。他说:“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敌人已开始同我们正面相持,回师加强对其占领区的‘扫荡’,我们当时强调运动战的方针,企图建立正规的作战,离开了实际,夸大了自己,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⑧对罗荣桓的说法,被卫立煌誉为“忠厚长者”的朱德表示认可。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作建军报告时,他回顾道:“华北工作在抗战

① 《党军建设问题》(1940年4月21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296页。

②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各师的部署致中央军委、周恩来等电》(1937年10月12日),《八路军·文献》,第66页。

③ 《卫立煌电蒋中正经与朱德等研讨今后战略上应将华北划分为游击战区进行游击战术及切断公路铁道并武装群众及拟请补充各军所需军械》(1937年11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5/00001/097。

④ 参见《战术问题》(1941年2月15日),《左权军事文选》,第602页。

⑤ 参见《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1940年5月2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301、310页。

⑥ 《建设我们的军队(代发刊词)——彭副总司令一九四〇年六月四日在××支队排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5),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⑦ 《建军报告》(1945年3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09页。

⑧ 《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10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第一阶段的整个四年中,对敌估计的偏差在于轻视日寇的力量。”^①彭德怀的看法也与朱德、罗荣桓相似。晚年,他在自述材料中坦率地写道:“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②

上述彭德怀等负责前方军事指挥的领导人所考虑的问题,毛泽东当然看到了。有时,他也会从同样的角度出发,表达出一些与彭德怀等人观点近似的意见。如忻口战役期间,毛泽东提出一一五师全力向日军后方交通线攻击计划所蕴含的意图,正是尽可能延续国民党军的正面抵抗时间,为中共在山西建立根据地创造更好的环境。^③而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则指出,在敌后长期的坚持中,游击武装应当通过连续的实战锻炼,提高质量,逐渐学会打运动战。^④另外,对日军的战斗力水准,在前方负责指挥的彭德怀等人都无法较恰当评估,身处后方的毛泽东就更加难以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了。^⑤但是,毛泽东头脑中异常强烈存在的弱者生存法则,终究让其无法赞同彭德怀等人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原则,尽可能抓机会对日军进行突击、打运动战的做法。

一般来说,弱者是否可在强敌环绕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以及生存的好或坏,关键在于强者给弱者留出的活动空间是大是小,是松还是紧,而这常常又受强者对弱者的态度左右。这也就意味着,让强者在一定时期内忽视自己,是弱者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存质量要做的最基本工作。关于这点,毛泽东早在1928年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就已经意识到了^⑥,并且在与国民党各派系对手较量时运用得异常熟练。^⑦抗战时期,随着敌后整体形势渐趋紧张,面对日军这样一个军事力量远远强于国民党各派系的对手,毛泽东的弱者意识只会愈发强烈,作战上也就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在他看来,当日军对八路军了解比较有限的时候^⑧,最好还是不要向日军过早暴露实

① 《朱总司令在七大建军报告(初稿)》(1945年4月23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81年编印,第515页。

② 《彭德怀自述》,第239页。

③ 参见《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66页。

④ 参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258—261页。

⑤ 翻阅当时的材料,可以明显看出,后方对日军的了解远不如前方。如关向应曾致信王稼祥与谭政说:“(郭)化若同志关于冀察晋边区粉碎日寇大举围攻中的经验与教训一文,对于战争指导上有相当的影响,其中对敌人的估计(这包括着战略与战役与战术的问题)有许多不合事实、不正确的地方,只[至]少是太想象了,而且不少是反映五次‘围剿’(国内战争)时的型式的重复。”《关向应同志给王主任谭主任的信》,《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8),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二〇师战史》编写办公室1994年编印,第25页。

⑥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说道:“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1),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

⑦ 相关研究可参见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0—11页。

⑧ 整体看,从武汉会战结束至百团大战开始前,日军对八路军的重视程度还是不足,对八路军的了解也较匮乏。例如,日军参谋部门1939年9月绘制的八路军实力统计表中,估计华北八路军主力仅有12万人,长短枪及轻重机关枪4万余支。与当时八路军的统计相比较可知,日军大大低估了八路军的力量。在此,以一二〇师为例进行说明。截止到1939年10月,一二〇师已有4.7万人,长短枪及轻重机关枪2.3万余支。然而,日军1939年9月的统计中却判断一二〇师仅有2.6万余人,长短枪及轻重机关枪1.4万余支。百团大战开始后,日军被八路军打得措手不及,其实也与其低估八路军的实力有很大关系。因此,日军后来总结道:百团大战前,对中共了解确实不够,“在作战战斗情报及治安情报之综合利用方面颇嫌不足……在其夸示实力之前,对其实力之掌握十分困难”。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廖运潘译:《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第595页;杨弘、卢云山编:《周士第将军阵中日记》,2005年印,第249页;「北支那方面共產軍配置要図」、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1537400、昭和14年「陸支受大日記第69号」其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力,过度吸引其注意力。^①然而,考虑到现实需要,对前方指挥员的尊重,尤其是不能完全把准日军战斗力的脉,毛泽东也无法彻底反对方的一些做法,只能予以包容。因此,进入抗战战场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八路军在作战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运动战色彩。对此,彭德怀在194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以下简称“北方局”)高干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有过详尽说明。他说,百团大战前“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曾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平型关的胜利到粉碎九路围攻”,特点是“基本的是集中兵力、协同友军打击敌人”,“基本上是有后方的正面作战,但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分散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太原失守前与失守后,集中有程度上的不同”。第二时期为“粉碎九路围攻到去年三月三十个团的整军”,特点是“全部转入敌后,由正规军分散进行游击战,由正面的正规战转入敌后的游击战,由集中指挥到分散指挥。但还进行了部分的运动战”。第三时期为“去年三月三十个团的整军到百团大战的开始”,特点是“分散与集中相对的平衡,但在地域与时间上均有不同。地域上,如山东仍是以发展为主,河北、山西以巩固为主。时间上,去年十二月以前与以后,分散与集中亦有程度上的不同”。^②也正因此,后来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时,彭德怀说道:“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③

三、走向统一

由上可知,彭德怀等人坚持在作战时打一些运动战,而毛泽东对此也予以相当程度的包容,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都没有较准确地摸清日军的战斗力。故可以说,只要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大体知道,以八路军现有实力,在较短时期内不可能具备对日军进行运动战的条件时,双方在作战原则上的分歧也就有了消弭的可能性。这个具有拉近双方认识意义的拐点,出现在1940年冬季百团大战结束之后。

百团大战,是抗战相持阶段八路军总部在敌后战场组织的最大规模战役攻势。当时,八路军总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猛烈破击日军“囚笼”支柱铁路交通线,以期威胁日军基本兵站线,迫使日军从根据地内撤回一部兵力,从而延缓日军向根据地内的推进势头,减轻根据地的压力。整个战役打下来结果并不理想,八路军总部的设想基本落空。不过,经过这次战役,前方的彭德怀等人和后方的毛泽东都清楚认识到,以八路军的现有技战术水平和武器装备,无法同日军进行过多、过大的运动战。如在1941年5月完成的打击日军修路计划中,聂荣臻提出能够以三个营兵力对日军一个小队施以歼灭的打击即可。^④对比上文所提全面抗战前期八路军总部制定的作战要求:“山地以我军

① 王震后来回忆道:“我到延安……当天主席就找我,我说:主席,百团大战是很大胜利……主席就不大高兴了,说:‘这是暴露了我们……’。”《王震部长谈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一二〇师战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12月9日),《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9),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二〇师战史》编写办公室1994年编印,第230页。另外,毛泽东在百团大战期间的讲话也反映出这种思路。比如,1940年9月11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9月23日,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时,毛又讲百团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个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这是“一次”,因为以后还要有;“更大规模”表示以前有过大规模的反“扫荡”,但这次更大;“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表示不是战略反攻。由此可见,相比前方和大后方,毛泽东这时明显在压低调门。而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不希望百团大战引起对手的过多注意。《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中),第207—208页。

② 《关于百团大战》(1940年9月25日),《彭德怀军事文选》,第81—82页。

③ 彭德怀:《庐山笔记》(1959年),转引自《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④ 参见《聂荣臻关于粉碎日军“治安肃正”计划致各部队首长电》(1941年5月18日),《八路军·文献》,第642页。

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可以明显看出,八路军高级指挥员此时已意识到之前低估了日军的实力,不得不降低对部队作战的要求。然而,彭德怀等人仍心有不甘。1940年底,刘伯承在新年展望中依然强调:“进攻的破击仍成为一九四一年主要的作战……破击重点首先放在基本段,其次方放在前锋段。首先要求做到的,就是:使日寇基本铁路网不能发展,然后才迫使其回到原来点线上。”还说:“我们必须坚定信念于运动战中,以适当兵力在适当时间内不避伤亡的战斗,消灭日寇一个大队。”^①

既然希望继续打运动战,那么提升军队战斗力也就成了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的唯一选择。因此,在太行根据地反“扫荡”刚刚结束的1940年11月13日,八路军总部就命令各部尽快完成补充。11月28日,又罕见地对各战略区下发了措辞严厉的冬春季4个月部队整训指示。在此指示中,八路军总部首先提醒各部:“必须深刻认识我军……在军事方面战术的、技术的以及一切管理教育的进步,极为微弱”。接着,列举了官兵在技战术上存在的种种缺点:

有不少中、下级干部在作战指挥中,尤不善于组织与指挥战斗;不善于掌握部队;不善于识别地形、寻找战术上的优良机会;不善于组织火力与运动;不善于组织在各种不同情况运用适切情况的战斗队形;不善于射击指挥与维持射击纪律;不惯与比邻部队之协同;不惯通讯联络;不惯步炮协同;不识别各色〔种〕技术兵器之性质与威力与防护方法;不懂各兵种与各种兵器之性能与威力;不善土工作业;不善特炮战斗;个别勇敢〔者〕以及个别部队,战术演成某些恶劣作风等等。在战士方面,则一般的各种战斗动作不熟练,不知利用地形、地物;射击技术很差,不懂射击纪律,不爱惜弹药,不会打手榴弹,不会刺杀,白刃扑搏的顽强性不够,不知爱惜武器等等。

最后,提出整训中军官、士兵的教育与训练重点,要求军队在整训时围绕这些重点展开,提高部队技战术水平。^②

不仅如此,事实上,八路军总部还尝试进一步改良军队的武器装备。1941年1月1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汇报太行兵工厂1941年的生产计划。他说,1941年太行兵工厂的预算初步定为500万元,至少要生产出步枪3300支、掷弹筒3500具、步枪子弹100万发、炮弹20万发、手榴弹70万枚。^③比起太行兵工厂1940年的实际产量——步枪3360支、步枪子弹12.2万发、手榴弹7.4万枚^④,可以说,彭德怀提出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增产计划。而这个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在一年后可以改善40个步兵团的装备,令其达到“日军山地低级步兵装备”的水准。^⑤可见,在百团大战结束后,八路军总部设计了一个异常庞大的强化军队的方案,尝试从官兵技战术水平和部队武器装备两方面同时着手,以尽快提升部队的战斗力。然而,就当时的情势论,八路军根本不具备在较短时期内完成这一方案的基本条件。

首先,提高官兵技战术水平问题。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成果被广泛用于战争,武

① 《我们怎样从一九四〇年向一九四一年迈进》(1940年),《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343—344页。

② 《朱德、彭德怀、左权关于冬季军事教育的指示》(1940年11月28日),《八路军·文献》,第589—590页。

③ 参见《彭德怀关于一九四一年军事工业生产计划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14日),《八路军·文献》,第605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244页。

④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军工部一九四零年工作总结》(1941年2月10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4),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⑤ 《彭德怀关于一九四一年军事工业生产计划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14日),《八路军·文献》,第605页。

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大增,战争对于军事人员文化水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在这方面,八路军明显先天不足。由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民文化素质提高速度异常缓慢。1930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估计“全国不识字的民众,约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①考虑到城乡之间的差异,大致可判定,农村不识字民众的比率应在80%以上。以农民为基本力量逐渐发展起来的八路军的整体文化水准,当然也无法令人满意。据罗瑞卿1941年12月初的报告,一二〇师1940年统计,“班以上干部识字不足五百者尚占百分之三十六,团级干部百分之十六,营级百分之三十五,连级百分之五十,排级百分之六十五”,“战士识字不足五百者占百分之六十七”。一二九师1941年统计,“排以上干部识字不足一千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团级百分之一点九,营级百分之四点四,连级百分之十五,排级百分之三十七”,“战士识字不足五百者为百分之七十六”。^②由于文化程度低,八路军基层官兵试图短时期内完全掌握武器的科学使用方法时,常常会遇到巨大困难。如一二〇师塞北军分区反映,教员所讲授的内容,战士“能懂得约50%,但能记住的恐不到30%,好多战士今天讲的课目当天能讲出一部分,但到明天便忘记了”。^③

此外,当时敌后的环境也不利于八路军以较大规模集中起来进行整训。在日军点线密布的平原地区,如果八路军以旅、团为单位集中起来,得到情报的日军很快就会从各据点出动,向八路军驻地进行包围合击。如1940年秋,冀南军区新四旅集中起两个团,准备进行阅兵,以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然而,此时日军也分路向其驻地包围过来。旅指挥机关只好取消阅兵,组织突围。^④在山区,八路军以旅、团为单位集中后遭日军合击概率虽远小于平原地区,但还是要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担任警戒,以防不测。如三八六旅所属七七二团为保障1941年全团整训顺利进行,最多时曾派出1/3的部队到日军据点附近游击。^⑤而且,由于山区过于贫瘠,如何保障集中整训部队的给养供应也是一个大问题。如为了供给整训期间所需的粮食,在1941年整训开始前,七七二团指挥机关不得不将大部分部队抽出,派入敌占区征粮。^⑥总体来看,由于自身缺陷和外部环境恶劣,八路军的技战术水准基本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

其次,发展兵工改善部队武器装备问题。彭德怀等人要扩大发展兵工厂生产,首先就需要解决500万元建设资金的问题。但就中共1941年的情况而言,实际上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如此巨额的款项。

全面抗战前期,对于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最重要者,应是按月发放的军饷60余万元。而其中半数必须留给陕北后方开支,所以真正可供八路军支配者每月经费仅30万元左右。朱德1938年3月12日致电毛泽东讲道:“山西我军已达九万人,每月经费仅三十万元,吃穿用全部在内。”^⑦1939年5月7日致电华北各部,又讲道:军饷“除陕北留守兵团(十二个团)巩固边区政权及河防所必须之经费外,剩余给前方款暂兑三十一万八千元”。^⑧

① 董凤生:《广州的文盲问题》,《新宇宙》第2卷第1期,1935年7月,第12页。

② 《罗瑞卿同志关于部队文化水平及教育状况向总政的报告》(1941年1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6),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05页。

③ 《塞北军分区司令部一九四二年年终军事工作总结报告》,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7页。

④ 《吴富善回忆录》,蓝天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⑤ 参见《第七七二团1941年作战总结报告》(1941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09团历史资料汇编》,红军团史编写组1993年编印,第376页。

⑥ 参见《第七七二团1941年作战总结报告》(1941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09团历史资料汇编》,第376页。

⑦ 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73页。

⑧ 《朱德等关于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致各兵团首长电》(1939年5月7日),《八路军·文献》,第343页。

显而易见,这笔款的数量太少了,大致在1937年12月就已不敷八路军开支。^①因此,全面抗战前期,八路军主要还是依靠从华北根据地筹粮筹款,应对日益增加的脱产人员与各项建设事业的需求。而面对八路军不断增多的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根据地则很快表现出疲倦与不支。到1939年末至1940年春,根据地潜力耗尽的趋势已很明显,以致连部队军粮供给都出现了严重短缺。^②

华北前方困难,陕北后方的情况也不好,尽管有八路军的一半军饷及其他外部援助资金补助。1940年10月21日,朱德致信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副院长陈康白:“我回延安已四个月,参观过许多工厂及一切建设,并讨论过财政经济及过去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个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③可见,截止到1940年春夏之交,中共的财政经济问题已相当严重。而国民党政府于1940年11月停发八路军军饷,则使整个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可能再抽出资金用于发展兵工生产。所以,接到彭德怀1941年太行兵工厂生产计划电后,毛泽东于1941年1月19日复电,直截了当地告诉彭:“兵工厂依现有条件很难扩充。”^④

实际上,当时不仅是无法在较短时期内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百团大战后,由于日军变本加厉推行“蚕食”“扫荡”政策,及国民党政府施行限制政策,根据地人力及物资供应更加困难,中共方面连如何维持部队现有战斗力,都逐渐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⑤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又愈益表现出保存实力、以待战后的趋势^⑥,再继续拼下去、消耗基本力量的后果已经非常清楚了。不仅不可能改变敌后战场的态势,而且会严重影响战后中共的生存。因此,大概到1941年夏,彭德怀等人已不再如过往一般坚持集中兵力进行突击、打运动战了。5月21日,八路军总部致电各战略区,指示他们研究不使用大兵力而能持续进行有效破击的方法。^⑦11月1日,彭德怀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谈道:“由于敌我装备的悬殊,敌寇广泛地采用堡垒主义,普遍地修路掘沟,逐渐封锁与割绝我根据地,因此运动战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在平原已经不可能。游击战的比重大大增加;普遍的游击战,已成为敌后最基本的战争形式”,“今天的正规军,基本上应着重于提高质量,学习游击战,反对不适合战争环境的军事公式主义与形式主义。”^⑧这一态度明显向毛泽东的一贯主张靠拢。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各战略区,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反对空喊运动战……空喊决战,急躁盲动。”^⑨12月,左权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上作新一年规划时讲道:“巩固根据地,积蓄力量,拖时间”是1942年的基本方针。“在不利情况下之反‘扫荡’作战,一般的应采取灵活的、分散的、先后的转移,遵照一般的内线作战指导原则已不适用了,一般是初期以积极的游击动作,其主要目的是查明情况,中期是分散的转移,末期向敌作

① 参见《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加强统战教育》(1937年12月6日),《周恩来军事文选》(2),第72—73页。

② 参见《林枫副委员长谈抗日战争时期一二〇师即晋绥根据地战争的几个问题》,《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9),第537—538页。

③ 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中),第1000页。

④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244页。

⑤ 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243—244、251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331—332页。

⑥ 参见《陈赓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⑦ 参见《朱德、彭德怀关于青纱帐期间交通破击之准备工作致贺龙等电》(1941年5月21日),《八路军·文献》,第643页。

⑧ 《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军事文选》,第122—123页。

⑨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八路军·文献》,第716页。

分散的或适当的集结打击敌人”。“向敌主动[进行]战役作战,力求短促与干脆,一般不采用百团大战形式,而是分区的、先后的进行,当然某一区进行时,邻区之配合是可以的、必要的”。^①至此,中共高层在作战原则上的分歧终于弥合,前后方的意见完全统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华北战争形势变化,迅速决定以全力在敌后战场活动,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壮大力量、长期坚持、辅助国民党军正面抵抗。不过,面对变化不定的形势、陌生的环境与全新的强大对手,如何才能最有效率地实现这些目标,中共中央没有充分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相当程度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因此,对于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具体问题的处理思路与方式,中共高层间出现一些不同意见和看法,也属正常。本文所讨论的敌后作战原则存在分歧问题即是其中一例。

中共高层间关于作战原则的分歧与诸多因素有关,但最关键的则是很长时期内对日军战斗力都不完全摸底。军事作战是一个“不同于只有一种答案的数学例题”的实践问题,“许多可以使用的解答方法之中哪一种最好,在做出尝试之前,谁都说不出来”。^②面对现代化的日军,认知上出现落差难以避免,而毛泽东面对这一问题时,其态度的坚决与处理方式的审慎,又可见一个杰出领袖的韬略。当不断积累起来的作战经验使得中共高层一致意识到,以八路军的实力不具备对日军进行过多、过大规模突击的条件时,一块石头终于安然落地。

[作者邹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关于一年来作战、建军情况及明年军事方针与任务》(1941年12月),《左权军事文选》,第806—807页。

② 《施特恩给中央苏区的电报草稿》(1934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1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No. 1, 2020

Task is Arduous and Road is Long *Gao Shihua*(4)

Daily Life in the Base Area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uang Daoxuan*(5)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great changes occurred in the CPC Base Areas, and the same in daily life. Short of supplies caused by the war situation w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daily life at that time, but through its own efforts, the CPC trying to improve and enrich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From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daily communication, family life, to language concepts, gender relations, the life and mental state of the Base Areas had improved alot, which was a revolutionary change after the entry of the CPC.

An Analysi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s Operational Principles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Zou Cheng*(26)

From the outbreak of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to 1941, there were subtle differences in the views of the CPC high level to th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behind enemy lines. Although Mao Zedong did not reject mobile warfare, he was obviously more committed to the policy of guerrilla warfare, while Peng Dehuai and others, beside guerrilla warfare, putting more emphasis on the necessity of mobile warfare. As a result, the Eighth Route Army had some color of mobile warfare in its operations before 1941. The key factor was that in a long period the frontline did not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Army. The reason of Mao Zedong, who preferred to the guerrilla warfare, tolerating the mobile warfare in the frontline, also related to the fact of not completely understanding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Army. With the end of the Hundred-Regiment Campaign, the CPC high level generally realized that it was not realistic to carry out excessive and large-scale mobile warfare with the Japanese at the time, and it became a consensus to the principle of guerrilla warfare.

Reorganization of the Reasonable Burden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Order of Collec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the Resistance Bases of Taihang and Taiyue *Li Yepeng*(42)

“Eliminating Enemy's Spies:” The CPC's Dog-Eliminating Campaign in CPC's North China Resistance Bas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Song Hong*(57)

The CPC's Dog-Eliminating Campaign in the Resistance Bases in North China was an intersection of its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which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PC to mobilize the people in the state of war. The Dog-Eliminating Campaign was caused by the covert nature of the CPC members' actions, and the demand for the concealment was also relating to the overall confrontation situa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Japanese Army. In the Dog-Eliminating Campaign, the first problem encountered by the CPC was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face of all kinds of concerns and dissatisfaction, the CPC used its skilled experiences for mass work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and fully took care of the public moo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g-eliminating and the handling of related problems. The Dog-Eliminating Campaign cannot be understood as a case of natural success, but a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CPC's decision-making, implementation and success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